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近代的超克” 論序章：昭和意識形態批判

Introduction to "Overcoming the Predicaments of Modernity": Critique of Shōwa Ideology

doi:10.6752/JCS.200806/SP_(6).0002

文化研究, (6_S), 2008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_S), 2008

作者/Author：子安宣邦(Koyasu Nobukuni);董炳月(Bing-Yue Dong)

頁數/Page：8-1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6/SP_\(6\).0002](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6/SP_(6).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The Problematics of Asia as the Line of Resistance

亞洲作為抵抗線的問題意識



子安宣邦(1933-)，出生於日本神奈川縣川崎市，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了(專攻倫理學)，大阪大學文學博士。曾擔任過橫濱國立大學教育部助理教授、大阪大學文學部教授。並在德國杜賓根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校教授過日本思想史。亦擔任過日本思想史學會會長(1990-1994)。現為日本大阪大學名譽教授。專門領域為日本思想史，對於文化理論、現代思想方面亦多有發言。大學退休之後，開設了許多市民講座，並定期推行思想史講義。主要著作包括：《作為「事件」的徂徠學》、《江戶思想史講義》、《作為方法的江戶》、《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精讀》、《鬼神論——神與祭祀的論說》、《國家與祭祀——國家神道的現狀》、《「亞細亞」是如何被論述的——近代日本的東方主義》、《日本民族主義的解讀》、《何謂「近代的超克」》、《昭和是什麼?》等。詳細著作請參考子安宣邦著作目錄(頁221-229)。

亞洲作為抵抗線的問題意識

《文化研究》第六期（增刊）（2008年夏季）：9-18

「近代的超克」論序章： 昭和意識形態批判*

Introduction to “Overcoming the Predicaments of
Modernity”: Critique of Shōwa Ideology

子安宣邦

KOYASU Nobukuni

大阪大學名譽教授

董炳月 翻譯

Bing-Yue Dong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所謂「近代」，要言之，那只能說不外乎
自己這十幾年間所體驗過的混亂自身。

——龜井勝一郎，「近代的超克」座談會

可以說，「近代的超克」即為日本近代史之難關的凝縮。

——竹內好，〈近代的超克〉

一、竹內好的戰後發言

竹內好在發表於昭和26(1951)年9月號《文學界》上的論文〈近代主義與民族問題〉中，就「日本浪漫派」在戰後的被默殺一事提出了看法。「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在內的近代主義者們，避開鮮血淋漓的民

* 本篇由子安宣邦教授及日文版發行單位青土社同意授權，出自子安宣邦新著：《「近代の超克」とは何か》（何謂「近代的超克」），東京：青土社，2008。本篇為第1章〈「近代の超克」論の序章：昭和イデオロギー批判〉，頁9-22。

編按：本專題內所有使用「近代」和「現代」的字眼，兩者均指「modernity」，惟子安宣邦在使用「近代」一詞時，有其對話脈絡及特定語境，因此在編輯時並不特意修改成「現代」，兩個字眼的使用採用言說者的用語。

族主義前行。把自己判定為受害者，將民族主義的極端化看作是自己責任之外的事情。默殺『日本浪漫派』被認為是正確的。」¹竹內撰寫該論文的那一年——即昭和26年——我進了大學。我的大學入學與反戰運動具有直接的關連性。朝鮮戰爭在前一年(1950)爆發，美國建構的日本占領體制被迅速地重建為反共軍事體制。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日本国とアメリカ合衆国との間の相互協力及び安全保障条約)相伴隨的《舊金山和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日本国との平和条約)簽訂於舊金山，是在竹內好發表上面這篇論文的昭和26年9月。第二年，即昭和27年，以《安保條約》為基礎的《日美行政協定》(*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under Article III of the Security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Japan*，日本国とアメリカ合衆国との間の安全保障条約第三条に基く行政協定)簽署，日本國內進行了美軍基地的興建或擴建。反基地鬥爭就穿插在我當時的校園生活之中。在此借竹內的論文談具有個人歷史色彩的事情，是為對竹內這種戰後發言背後的1950年代日本的狀況進行我個人式的確認。

我是面對被編入反共軍事體制、實行再軍備的日本的現狀，從反戰、反民族主義的志向出發，站在對立面進行抵抗。因此對我來說，竹內好那種包含著反諷的兩義性言論是無法理解的，並具有情感上的**錯位**。其無法理解之處，就像從本文開頭引用的文章中能夠看到的，在於將反近代主義與民族主義相連接而構成的竹內好的反語式、兩義性的民族主義話語。不言而喻，在當時我未曾對竹內話語進行這種分析。當時的我僅僅是對於竹內民族主義懷有不可理解的印象。對於我來說，不可理解的竹內好的言論，在1959年的「近代的超克」討論中與龜井勝一郎保持一致，進而發展成為表述太平洋戰爭（大東亞戰爭）自身之兩義性、二重性的言論——所謂「大東亞戰爭是殖民地侵

1 竹內好的〈近代主義與民族問題〉最初刊載於《文學界》雜誌的「民族問題在日本」特輯（1951年9月），後收入《革命與人的解放》以及《國民文學論》。本文依據《竹內好評論集》第二卷《新編日本意識形態》（東京：筑摩書房，1966）收錄版本。

略戰爭，同時也是對帝國主義的戰爭」。²對於當時的我來說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到現在依然不能說已經理解的竹內話語的兩義性，大概就是對於昭和史或者日本現代史——集中體現為長達15年的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昭和史或者日本現代史——的反語式話語的兩義性。

而且，在1960年代以後的很長時間裡未曾思考過竹內好的我，再次審視其戰後發言，是到了被稱作戰後50年的時期。那是80年代末，時間上與柏林圍牆坍塌這種世界歷史的轉折相重疊，也是近代日本或者昭和究竟為何物這一問題從根本上被重新追問的時期。那個重新追問的課題也交給了我。³我是一邊回答那個課題、一邊重讀竹內好的戰後發言。而且，在現在主動接受「近代的超克」論這一課題的同時，我通過思考認識到竹內戰後發言中包含的兩義性自身，在將戰前昭和歷史與戰後建立關係的同時，提供了解閱讀「昭和日本」或者「昭和近代」的鑰匙。

二、竹內的反語式兩義性

竹內戰後發言中的兩義性，可以直接歸納為近代日本在亞洲之中而非亞洲一語。竹內好大概是使用了地緣政治辭彙，將對於既是亞洲又非亞洲的日本的那種迷戀與否定，進行了雙重性、矛盾性的表達。而且，竹內好也是從那場戰爭中看出二重性——為了亞洲的戰爭與對

2 竹內好的論文〈近代的超克〉是為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第七卷《現代化與傳統》（東京：筑摩書房，1959）而作。後來又被收入現代日本思想大系第四卷《民族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63）、《近代的超克》（東京：筑摩書房，1983）等。本文依據《竹內好評論集》第三卷《日本與亞洲》（東京：筑摩書房，1966）收錄版本。

3 該課題本是應邀為「岩波講座·現代思想」的編輯與雜誌《現代思想》而撰寫。其成果編輯整理為《近代知識考古學——國家、戰爭、知識人》（東京：岩波書店，1996）。關於竹內好，是在該書第四章〈論日本的近代與近代化——戰爭與近代日本的知識人〉進行敘述。另外，《日本近代思想批判——一國知的成立》（東京：岩波現代文庫，2003）為該書的增補修訂版。

於亞洲的戰爭。我們現在是將昭和日本的戰爭稱作「亞洲—太平洋戰爭」。我認為這種命名自身與其說是肯定了竹內所說的戰爭二重性，不如說是已經否定了這種二重性。不過，圍繞戰爭的二重性下文還會涉及，這裡暫且不論。在此，我試圖思考一種可能性——將竹內好這裡的兩義性概念、將那場戰爭在歷史的中心所擁有的「昭和日本」或者「昭和近代」這種時代的反省性的知識（例如本章副標題提出的作為「昭和意識形態論」），作為批判性地發現並展開問題之視角的可能性。

竹內好這裡的反語式兩義性話語，就像從前面引用的重新評價「日本浪漫派」的言論中所能看到的一樣，是由反近代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連性組合而構成。所謂近代主義，在竹內話語中是民族主義的相關性對立項。「近代主義在日本文學中具有統治性傾向，這是我的判斷。所謂近代主義，換言之，即不包含或者排除思考民族的路徑。就是如此。」竹內在前引論文中這樣說。就像這裡用十分竹內色彩的主觀的、對含意缺乏說明的判定性語調所表達的一樣，近代主義乃是與民族主義對立的某種之物，民族主義即反—近代主義的某種之物。二者確實構成相關性的對立項。將此二者作為相關性對立項的兩義性話語，是這樣展開的。

日本的近代只要是以歐洲式近代為指歸之物，所謂作為其「反」的民族主義就是對於本土式亞洲的追求。而且，對於日本而言，近代只要作為表層變化的近代，作為其「反」的民族主義，就將要求源自深邃的亞洲底部的變革主體的出現。或者，日本的近代國家只要被看作是通過對先進歐洲式文明的模仿式接受而形成的偽似近代國家，作為其「反」的民族主義就會追求擁有民族魂的真正的民族國家。要言之，日本的近代如果是**外來**的，作為其「反」的民族主義就會主張亞洲的真正的近代。

所謂構成這種兩義性話語的反語，意味著一種話語態度——在從根本上不停地追求真正之物的同時，一心否定在表層上實現的偽似之物。這正是提出「作為反諷的日本」的日本浪漫派或者保田與重郎的話語態度。竹內共有、繼承了保田的這一浪漫主義反語式話語。由對

於日本表層近代的偽似性的否認、對於亞洲式日本及其民族主體深層的鍾情而構成的竹內反語式兩義性話語——對這種話語進行了以上詳述之後，就能知道這已經是「昭和日本」的反思性知識所構成的歷史性自我理解、日本理解的話語。

三、「昭和日本」、「昭和近代」

我在這裡所謂的「昭和日本」或者「昭和近代」，指的是從亞洲、太平洋戰爭開始的昭和以致於昭和結束的時代。或者說是指日本始自1930年代、延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時代。就是將只把所謂太平洋戰爭作為戰爭來區分「戰前」、「戰後」的時代，與15年戰爭⁴同時開始，開戰之後多次聲稱戰爭終結但總也終結不了、延續到戰後的時代作為一個時代，此即我所謂的「昭和日本」。將此「昭和日本」稱之為「昭和近代」，是因為這個時代確實是那種追求思想超越，「超克」被宣揚甚至成為討論主題的「近代」所統治的時代。在「昭和近代」，「反-近代主義」與其時代主流對峙。在關東大地震之後完成復興的帝國之都是作為現代大東京出現。有馬學指出，在戰前昭和的日本社會，與「非常時期」這種意識同時，「近代主義」也浸透了社會。⁵我也將1941年開戰之前的昭和戰前時期看作是一個近代化完成時期——日本社會從城市生活，到文化、言論、學問諸領域完成了近代化。⁶「反-近代主義」亦為此時完成的「近代」所生產的。而且，反-近代主義者在這時期重新將「近代」界定為以歐洲為起源的外來「近代」、即「歐洲式近代」。「昭和近代」就是這樣對自己的近代性

4 編按：15年戰爭指1931-1945年的日本侵華戰爭。

5 有馬學，《帝國昭和》，日本的歷史23，東京：講談社，2002。

6 我在重讀1920年代後期（昭和10年代前期）的《改造》、《中央公論》、《文藝春秋》等雜誌之後，深感日本輿論界新聞、雜誌的出版高峰期即在此時。而且，即使是從津田左右吉、和辻哲郎等人的工作來看，日本的近代學術也被認為是在此時期達到高峰的。有必要從這種日本社會近代化的視角重新討論昭和戰前期。

反覆地、不停地進行自我追問的時代。「昭和近代」的反思性知識，在持續追問這種日本近代性的過程中，對自我（日本）理解的話語進行了文學的、歷史的以及哲學的建構。這個時代就是「昭和近代」。

河上徹太郎說12月8日的開戰突然給我們的感情規定了「一個恰到好處的規則」⁷——姑且沿用其「規則之決定」即「近代的超克」，將這種昭和的反省性知識所構成的自我理解式話語稱之為「近代的超克論」。這種被稱作「近代的超克論」的昭和反省性知識所構成的自我理解式話語，與我前面詳述的竹內好圍繞近代日本的反語式兩義性話語相呼應、相重疊。甚至倒不如說，後者是從戰後的視角對前者進行了分層敘述。我想再一次回到竹內的兩義性話語進行思考。我是將歸結為「近代日本在亞洲而非亞洲」一語的竹內好反語式兩義性話語作為與近代主義、民族主義的相關性對立項而界定。因為「近代」與「民族」是互相作為對立項、互相規定的。只要日本的「近代」是被作為**外來之物**、被指為外部性、他律性而進行批判性的談論，作為其「反」的「民族」就會被指向作為**真正之物**的自立性內部的志向而建構。不過，這種兩義性話語帶有地緣政治學的性質。所謂作為**外來之物**的「近代」乃歐洲式近代，作為其「反」的「民族」乃必須從亞洲的深處尋找出的某種**真正之物**。由於竹內的兩義性話語帶有地緣政治學的性質，因此給予了解閱讀昭和話語的鑰匙。所謂昭和，即日本將非歐洲的自我進行地緣政治學的確認，或者被迫進行這種確認的時代。日本的近代確實進入了被稱之為「昭和近代」的時代。

四、「昭和近代」的起點

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日本儘管只是關心以圍繞德國在遠東地區的權益為中心的問題，但參與世界戰爭意味著日本積極進入世界秩

7 此為「近代的超克」座談會（《文學界》，昭和17年9、10月號）開始的時候，主持人河上徹太郎所言。筆者所引「近代的超克」座談會談話，根據《近代的超克》一書所載。著者代表河上徹太郎，創元社，1943。

序和世界歷史，不久也將提出重建世界秩序的要求。這裡所謂的「世界秩序」是指以歐洲為中心、由歐洲建構起來的近代的世界秩序，所謂的「世界歷史」是指世界被嵌入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秩序與經濟體系之中的現代史過程。被強制性地納入該世界秩序、開始建構近代國家的日本，現在積極進入該世界秩序，以致於也對該秩序中新的權益提出要求。日本在參戰的同時向中國提出的「21條」(1915)，是將中國、尤其是中國的滿洲，作為自己的權益範圍置於統治意志之下的要求，也是對東亞的國際秩序進行帝國主義式重新建構的要求。日本通過這場世界大戰，姿態鮮明地成長為「國際政治遊戲主要參與者」⁸中的一員。即日本在世界列強的行列中占有了位置。即巴黎和會認可了亞洲新強國日本的權益。這個來自巴黎的消息導致中國發生了5月4日的抗議運動。日本作為世界列強之一登上舞台，是與中國發生被看作歷史上最初始的民族運動相伴隨的。「昭和近代」就是這樣開始的。

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戰後過程，作為歐洲主導的世界秩序發生崩潰與解體的起點，從積極的方面進行解讀的，是京都的「世界史的哲學家」們。其代表人物高山岩男說，這場世界戰爭中必須注意的事實是，「由於這場世界戰爭，包含著東洋西洋的整個世界在真實的意義上成為統一的、歷史性的世界」，與此同時「由於這場大戰，歐洲近代的原理展示出徹底的破產」。⁹確實，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決定性重要之處，即在於「歐洲主導的世界統治體制的根基開始受到侵蝕」這一點。而且，現代史研究者今津晃記述道：「該過程經由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得以完成。」¹⁰由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惡性競爭導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後處理，就是發生在歐洲與新帝國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而且是指向已經開始擁有民族自覺性的殖民地、附屬世界的居民的，

8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看作是主要列強都參加的戰爭，將當時的主要列強都列舉出來，有歐洲的英國、法國、俄國、奧匈帝國、普魯士(德國)與統一後的德國共6國，此外列舉了美國和日本。(引自《二十世紀的歷史——極端的時代》[上]，河合秀和譯，東京：三省堂，1996)

9 高山岩男，《世界史的哲學》，東京：岩波書店，1942。

10 今津晃，《現代史概說》，東京：創元社，1973。

如何重新建構帝國主義並繼續維持的過程。所謂「昭和日本」的起點，就是帝國日本在第一次大戰後帝國主義式的亞洲重組過程中，一邊對應中國出現的民族主義運動，一邊侵入中國的過程。那就是15年戰爭的過程。

《世界史的哲學》將這一過程——即帝國主義的重組過程——作為歐洲式世界秩序的解體性轉換過程來記述。在《世界史的哲學》——這本因為將決定著帝國主義在亞洲重組的「大東亞戰爭」的開戰而下定決心要出版的著作——的開頭，高山說：「現今的世界歷史的大動盪、世界歷史的大轉換將要帶來的是什麼呢？我將其看作非歐洲世界對於歐洲世界將要獨立的趨勢或者事實。」而且，高山還說：「滿洲事變、退出國際聯盟、支那事變，貫穿這一連串具有世界史意義的我國的意志，不外乎是對於立足於歐洲近代原理的世界秩序的抗議。」¹¹這是包含著對於與15年戰爭同時開始的「昭和日本」的辯解的自我理解式話語。是將「昭和日本」作為超克歐洲近代世界的日本來理解。「今天的世界大戰絕非近代內部的戰爭，而是超出了近代世界的緯度，將成為與近代不同時期之標誌的戰爭。」《世界史的哲學》就是用這種文字開始書寫的。

五、昭和意識形態

高山岩男是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至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這個過程，作為歐洲世界秩序解體的過程來把握。這種歷史認識並沒有錯。但是，將帝國日本及其在亞洲進行的戰爭，作為基於對歐洲近代原理的世界秩序的抗議，並說成是決定其解體並超越之、引導新世界建設的道義行為的時候，那就成為用**正確的自我**（日本）理解來支撐「昭和日本」及其戰爭行為的話語，或者成為意識形態。這已經是獲得了對作為自己話語之死角的不明朗性進行修正的、**真正的自我**（日

11 譯註：這裡的「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支那事變」即七七事變。

本)理解話語。何謂「作為話語之死角的不明朗性」？那是圍繞「支那事變之意義」的不明朗性。

高山在《世界史的哲學》「序」中記述了在京都大學的教室裡開始講授該書內容時的情形。他說那是「支那事變發生之後」的事。「平日在教室裡經常見面的學生，畢業後不時有人奔赴戰場的時候。」大概就是在昭和16年(1941)「大東亞戰爭」爆發前2、3年的時期。學生們在課堂上向他提出的問題是：「支那事變的真正意義何在？」高山在講義中從世界史立場的回答未能說服向他提出這種問題的學生。高山寫道：「支那事變所具有的複雜性質，我覺得似乎基於世界史立場的討論也未能給予真正的理解。」高山對於自己基於世界史立場的討論是否具有說服力感到惶惑。但是，「大東亞戰爭」的爆發與隨後戰爭的進展消除了高山的惶惑。他這樣寫道：

由於大東亞戰爭的進展和擴大，支那事變所帶有的不明朗性質被除去，現在終於走上了一條十分明確的道路，容易陷於沉滯的道義生命力也被生動地發現。為此感到高興的同時，也感覺到負起了對於支那事變發生之初作為紀念而發表的言論的責任。

在思考「支那事變」對於昭和知識人和學生們來說所具有的意義的時候，這是極其重要的言論。其重要性大概能夠和竹內好記錄自己得到12月8日開戰的消息時之感動的〈大東亞戰爭與吾等之決意〉¹²相匹敵。「歷史被創造出來。世界面貌一夜之間發生了改變。我們目睹了那一切。被感動得發抖的同時，守望著那一道彩虹一樣的彼岸的光芒。」這種宣言式的文章記錄的是「大東亞戰爭」的爆發給予被置於黑暗中的他們的感動——像是帶來一道光芒的那種感動。那完全等同於高山在「序」中表達的內容。「支那事變」對於他們來說，曾經是作為像是被置於暗夜之中那樣沉重、那樣難以理解的不明之物而存在的。而「大東亞戰爭」則是快捷地消除了他們心中的這種不明確性，並投射入明亮的光之物。「支那事變」的複雜性現在用「大東亞

12 〈大東亞戰爭與吾等之決意〉（宣言）作為頭條刊載於1942年1月出版的《中國文學》第80期，作者未署名，但是是寫作於成立同人會之後的前一年的12月16日。

戰爭」進行了鮮明的解讀，即被作為承擔世界史意義的聖戰——使得由歐洲帝國主義原理構成的近代世界秩序發生轉換、引導我們進入由亞洲作為亞洲適得其所的新的道義秩序構成的世界。使用「大東亞戰爭」對「支那事變」之意義的解讀，是拯救與「支那事變」同時陷入困境的日本知識人的現代史再闡釋話語。

「昭和日本」的起點，就是第一次大戰後帝國日本在亞洲的帝國主義重組過程中，一邊對抗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一邊侵入中國。那就是15年戰爭這一過程。我在前面這樣寫道，這一過程才是使昭和知識人們心情沉重，其意義被學生尖銳質問的「昭和日本」的歷程。這一黑暗而沉重的歷程因「大東亞戰爭」而被重新閱讀——作為超克帝國主義式歐洲的近代諸原理、催生自立亞洲的道義歷程來重新閱讀。

「近代的超克」理論，就是將「昭和日本」陷於困境的知識人拯救出來的新的自我理解話語，即「昭和近代」歷史的再闡釋話語。那並非僅僅是京都的「世界史的哲學」宣導者們所擁有的話語。如同河上徹太郎在那場座談會開始時所言：「尤其是12月8日以來，我們的感情這種東西，在此恰到好處地展示出好像是某種類型的規則。此種類型的規則——這實在是無法用語言進行表達的——即我所謂的『近代的超克』……。」給他們的感情帶來「一個恰到好處的規則」的是12月8日「大東亞戰爭」的開戰。河上是說，這場開戰所帶來的感情規則如果用語言來表達，即為「近代的超克」。「近代的超克」這種理論，是給置身於昭和前期的15年戰爭過程中的許多日本人帶來「心之規則」的話語——那成為哲學家的話語、文學家的話語，乃至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話語。

「近代的超克」理論構成日本人在歷史中自我理解的話語，並非僅僅是昭和前期的戰前和戰中的事。在以圍繞昭和時期日本戰爭的思想性答案的問題遺留、延續下來的戰後世界，當日本的自我理解問題被置於歐洲近代與亞洲自立這種地緣政治學框架之中追問的時候，「近代的超克」理論也在戰後世界獲得再生。竹內好撰寫「近代的超克」論，也是在戰後日本從美國獨立的問題被探究的60年安保鬥爭即將到來的時期。「近代的超克」論確實就是昭和日本人自我理解的話語，就是昭和意識形態。